

(俄) 苔菲 著
谷兴亚 译

我的编年史

苔菲回忆录

Моя жизнь

(俄) 苔菲 著 谷兴亚 译

我的编年史

苔菲回忆录

Моя Летопись

Тэфф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编年史: 苔菲回忆录 / (俄) 苔菲著; 谷兴亚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3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 - 7 - 5598 - 0137 - 1

I. ①我… II. ①苔… ②谷… III. ①苔菲(1872 - 1952) - 回忆录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4436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米卡

责任编辑: 陈维

装帧设计: 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31.75 插页: 8 字数: 40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无与伦比的苔菲

斯·尼科年科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我偶然得到一本小册子,书名为《旋转木马》。作者嘛,是某个叫作苔菲的人。不过,刚读没几行,我便明白了,作者是位女士。小故事写得都很棒,而最使我吃惊的是一篇叫作《睁开双眼》的。两位俄罗斯人,一位法官与一位地主,坐在国外疗养地的饭厅里,为了消遣,开始凭外貌判断每个人的身份。他们于同在这里疗养的人们当中发现了杀人犯、澡堂服务生、刽子手与铁路大盗。他们自然说的是俄语。等从老板娘那里得知每个人的真正身份之后,他们两个都笑瘫了:铁路大盗们原来是来自美国的歌手,杀妻凶手是智商低下的百万富翁,澡堂服务生则是法国记者,刽子手嘛,竟然是位公证员,等等,等等。然而,最令他们惊诧的还在后面。三两天过后,他们收到一封信,是用俄文写的。“从这个贼窝里逃命吧!”俄国女地主霍尔金娜大声呼号,她已经逃之夭夭了。“你们让我睁开了双眼,认清了我们身边的罪犯。可是,我也认清了你们的真面目。‘这是整整一个伪币制造集团,’你们刚进来的时候用午餐者当中有人说。赶紧逃跑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也许你们还能悔过自新。”这个短篇非常可笑。同时又很聪明。它不仅逗人笑,而且还提醒人们:外貌,这还不是人,外貌经常是骗人的,而受骗经常发生在各个方面:或者将聪明人认成白痴,或者将恶棍当作善人。与此同时,苔菲在往

事回忆中也时常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她回忆鲍里斯·潘捷列伊蒙诺夫时我们读到：

“来的是一位文雅的高个子先生，四十五岁左右……”

我们作家的眼睛是敏锐的。我立刻就明白了——他是英国人。

他原来是地道的俄国人，西伯利亚人，五十八岁，化学家……”

这种惊变当然可以认定是作者的一个手法，她成功地将其找到并运用了半个世纪。

然而，事情未必仅仅在于手法。

是的，苔菲熟知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第一印象最可靠，不以貌相取人者必错无疑。苔菲恰恰不以表象论是非：她力图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剖析每一个人，理解每一个人。她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而且，她完成这一切时总是面带微笑，幽默诙谐，甚至还似乎带着几许歉意，做到惊人地自然，有分寸——这里谈的首先是她的文艺创作，但也适用于她的回忆录。她的回忆录同样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关于苔菲本人有许多回忆文章，所有这些文章照例都是赞赏有加。回忆录作者们直白地赞赏她的俏皮、俊美、机智、善良和聪明。

俄罗斯最鼎鼎大名的人都把褒扬的修饰语奉献给苔菲。不过，很少有谁指出过她的罕见的毅力与勇气，因为苔菲一向力争把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面目呈现给外部世界。按照数以百万计读者的观点，幽默故事的作者正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这并不是伪装面具，而是性格特征——不将自己的苦恼与艰辛展现出来。每个人他自己的困难已经够多的了。

回忆录的作者们一般总是从讲述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自己的双亲，祖先，家族的传统习惯，自己的成长过程。在苔菲的回忆录中这一切都找不到。当然，在其回忆录中不时也闪过某些片段和只言片语，家庭生活的某些场景，然而没有关于亲人们的细节描写，更没有家族的历史。1932年出版于巴黎的那本书，虽然命名为《回忆录》，实际上讲的仅仅是一件事，尽管是作者生活中重要的一件事——她与祖国诀别的延续了将近一年半的过

程：1918年秋天，苔菲与阿韦尔琴科以及几个演员出发去基辅巡回演出，从那儿又继续向南，于1919年底竟然……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二十年过后，苔菲试图出版一部新的回忆录。现在她将其定名为《我的编年史》——因为讲述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其他人（须知编年史作者写的不是自己，而是他有幸成为见证人的那些事件）。

能否从苔菲的回忆文字中得知关于她本人的某些事情呢？

当然能。因为，无论作者如何力求客观，他也必定要在某些地方透露出自己的心灵，必定要表达出他对其描写的人抑或人生际遇的态度。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即作者，是谁，是位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苔菲其人，即同时代人所描绘的那样的人——幽默，善良，魅力十足。

因为苔菲在回忆录中很少谈及她本人，现在我把其他传记作家搜集到的关于她的某些资料讲述给大家。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这就是她出生时的名字）于1872年4月末生于彼得堡。4月末——为何如此含混不确呢？这是因为在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物与苔菲研究者们所写的传记作品中，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日期：4月21日，24日，26日，27日，甚至还有的是5月9日（用公历则相应地为5月3日，6日，8日，9日与21日）！原因是作家本人有意尽量搞乱这个问题。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苏联出版界一般都说，苔菲出生于1876年（我自己在1967年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也是这样界定她的出生时间的）。1928与1935年巴黎省发给苔菲的证件上，她的出生年月日则注明为1885年4月26日。

如此看来，其真实情况尚需进一步挖掘。

不过，我们确切地知道，她的父亲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洛赫维茨基（1830—1884）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是刑侦学教授，律师，《司法通报》的编辑与出版人，多种法学著作的作者，出色的演讲家，一位十分机智的人。苔菲的母亲就其出身讲是法国人（娘家姓诺埃尔），熟知欧洲文学，尤其是她最热爱的诗歌。

然而,爱好文学的不仅仅是她的双亲,她的祖先更是如此。“自己作家的天赋我可以归功于返祖现象,因为我的曾祖父孔德拉季·洛赫维茨基曾经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共济会会员,撰写过神秘主义的诗篇,其中一部分以‘论圣母的兄弟之爱’为总题目收藏于基辅科学院的历史文献之中。”——苔菲自传登记表中这样写道。她的祖父弗拉基米尔·孔德拉季耶维奇则集哲学家与文学家的才能于一身。

那么,至少可以用家族传统来解释一个现象,即苔菲的三姐妹(玛丽娅、瓦尔瓦拉和叶连娜)都写诗和剧本,甚至很严肃的哥哥尼古拉(1868—1933),他后来选择了军旅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将军的身份在法国指挥一支俄国远征军),在幼年时期他也写过诗。洛赫维茨基家族中最著名的文学家是两姐妹——玛丽娅,笔名米拉(1869—1905),和娜杰日达。

娜杰日达在位于铸造街上的女子学校毕业之后,嫁给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弗拉季斯拉夫·布钦斯基,然后随他去了季赫温。丈夫在那里谋到了一个律师的职位。

生了两个女儿和儿子扬之后,大约在1900年,苔菲与丈夫分手,返回彼得堡,并在这里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关于她的孩子,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留在了父亲身边。

苔菲在晚年同长女瓦列里娅(1892—1964;婚后姓格拉博夫斯卡娅)来往密切,她们经常通信。1953年瓦列里娅·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将母亲的档案资料赠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巴赫梅捷夫档案馆。

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苔菲成果丰硕:革命前便在期刊上发表了几百篇诗歌、短篇小说、随笔、评论、特写和回忆录,还出版了几大部短篇小说集(《幽默故事集》两部,《于是便成了这样》《旋转木马》《生活》《僵死的野兽》等),一部诗集《七重火焰》(1910),几个剧本(在俄国一些最大的剧院里上演);侨居国外后她始终与一些报纸杂志合作,又出版了十九部著作,其中有诗集《沙姆拉姆》和《Passiflora》(两者均于1923年在柏林出版),短篇小说集《快步跑》《小城》《六月的书》《关

于温柔》《女巫》《再谈爱情》《冬日的彩虹》和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冒险的故事》……还可以补充的是,苔菲是文学团体“绿灯社”的稳定参与者,她与俄国的戏剧活动家和电影工作者合作,是巴黎俄国作家记者协会执委会成员。如此这般,她还有用于所谓个人生活的时间吗?关于这点,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然而,如果浏览一下她在侨居期间的一些著述,便会发现,其中许多书与许多短篇小说是献给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季克斯通的(《沙姆拉姆》《六月的书》等)。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季克斯通(1873—1935)革命前是彼得堡的大银行家,是苔菲的亲密朋友与未举行过宗教仪式的丈夫。温柔而深沉的爱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身染重病后,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始终照顾他,一直到最后时刻也未曾离开过他的病榻。

这一切,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在回忆录中根本就找不到。纯属私生活的东西苔菲深藏于内心,只留给她自己。

苔菲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她的晚年是沉重的:疾病缠身,日常生活艰难,稿酬减少(战后的巴黎俄语出版物开始缩减,较少出书,而且它们的发行量也太小),然而她勇敢地坚持到了最后。在她写给纽约的安德烈·谢德赫与马克·阿尔达诺夫的信中依然保持着思维敏捷、判断缜密、诙谐幽默,与对人的善意。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于1952年10月6日在最亲密的人们的围拢中辞世,安葬在了巴黎城郊的一座公墓中。

关于苔菲写了和印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然而,她在其祖国至今并不怎么驰名,虽说不久前出版了她的五卷选集以及几部短篇小说集。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苔菲曾名声煊赫,可以与公认的王牌幽默作家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相提并论,甚至还常常将首席的桂冠奉献给她。然而,我们的时代是如此多元的时代,如今“布克”比布宁的知名度更大,苔菲则常常被当作“台非”奖的创设人。前不久有人问我:“苔菲,这是个新俄罗斯人,是个企业家?真机灵啊。先是发大财,现在又在一本一本地写书。”在

革命之前,虽然缺少如此大规模群众性的信息手段,如电视与无线广播,苔菲的名字却全国知晓。

苔菲加盟《萨蒂利孔》周刊与后来的《新萨蒂利孔》杂志,结果是双方受益:她的短篇小说和随笔给杂志带来了巨大的声望,招来了新的读者;同时,借助杂志,苔菲的名声也变得越来越响亮。

形形色色的批评家都在评论苔菲,她的诗歌与随笔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也刊登,她不仅赢得了工人读者群的好感,他们的主要读物是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和《新生活》报;她不仅赢得了所谓小市民即城市居民、商人、店员,最后是知识分子们的好感——他们是《萨蒂利孔》周刊的订户,而且还有沙皇宫廷的订户。就在1903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的前夕,当问及邀请哪些当代作家入选纪念文集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回答道:“苔菲,只要苔菲一个人。”

苔菲仿佛一下子就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手法和文体。有别于其他许多幽默作家,她无须杜撰可笑的情景以赢得滑稽效果。她能在生活中,在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日常环境中,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发现确实可笑的东西。

关于苔菲发表在《萨蒂利孔》周刊上的优秀短篇小说,伊·阿·布宁说过,它们写得“健康,朴实,非常机智,有敏锐的观察力,是绝妙的嘲讽”。

苔菲的主题范围广,而且多种多样。使她感兴趣的有日常生活场景,有社会现实问题,有人的心理状况,有社会政治局势。她用几笔线条、寥寥文字,便能传达出人的内心世界,窥视他们的心灵,并将其展示给我们看。用少量的几页篇幅,通过几个短小的片段,苔菲就能塑造出鲜明、充实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性格。

苔菲的关于儿童的短篇小说同样充满了精致的心理描写与关爱。诗人与批评家尤里·捷拉皮亚诺公正地指出:“苔菲作品中的孩子——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

苔菲到巴黎侨居之后,她常常在记忆中回归俄罗斯,但她写得更多的是侨民们的日常生活。她的短篇小说《Ке фер?》(法语“做什么?”)作为在

巴黎俄国式生活的象征成了俗语。

苔菲的许多侨民小说散发着忧郁的情调。不过,她以前貌似十分可笑的作品也往往透过言语的组织散发出一缕缕忧愁。总的说来,她从来不曾是位职业的幽默作家,从来不将逗人发笑视为自己的任务。阅读她的短篇小说时,笑声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小说总是那么轻松自然。它们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全看它以哪个方面朝向读者的内心世界,——于是便激起相应的反响,因为在核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在语言背后,在人物言辞背后,在小说提供的场景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人的情感与感受的世界。

境外的俄罗斯人总是以焦急的心情期待着苔菲的新书,宛如某种礼物,因为,女作家甚至以自己忧伤的故事支撑着同胞们的精神,给他们以力量与信心。

时至今日,作为最优秀的俄罗斯国外文学批评家之一的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所说的关于苔菲的几句话,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公正性:

“……苔菲不想遣责任何人,也不想教会任何人什么东西……同时代人与同胞们从她的书中发现并嘲笑自己……

苔菲无意取悦于世人,她不想欺骗他们,也不害怕真理。但是却坚持不懈而又委婉地,仿佛在不经意间告诉人们,无论人们生存得多么恶劣多么丑陋,生活总归是美好的,如果其中有阳光、天空、孩子、大自然,最后,还有爱情的话。”

很想再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对于该作家严格的审美趣味和经验未必有谁会加以怀疑。“有过许多次,当人们打算赞扬苔菲的时候,就会说,她写得就跟男人一样。在我看来,每十位写作的男子当中,就会有九个应该向她学习那种无可挑剔的俄罗斯语言,”——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这样说。

无论在苔菲生前还是身后,对待她的态度向来不是单一的赞许。苔菲的辛辣与严厉的谴责有时会引起相关人的恼火、愤怒,甚至是仇恨。譬如,她对安德烈·别雷《灰烬》一书的否定评价,便成了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与瓦列里·勃留索夫攻击苔菲的动因。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苔菲某种程度上和缓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有些作家依然惧怕她尖刻的语言,不太喜欢她。弗拉基米尔·兹洛宾,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的朋友与秘书,在自己关于季娜伊达·吉皮乌斯的书《沉重的心灵》(华盛顿,1970)中说——譬如,苔菲在回忆录中讲到,当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得知他们的亲密朋友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菲洛索福夫的死讯时反应冷漠,就此兹洛宾写道:“他们不过是不想与苔菲谈论自己的痛苦而已。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不太喜欢她,认为她虚伪。”

否定对待苔菲回忆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文章的还有玛·萨·采特林娜女士(纽约《新杂志》的出版人之一)。苔菲甚至被迫给她写了几封回信辩白。将一封回信中的某些片段引述在这里还是很有必要的:

“某些说法传到了我这里,对此我是无论如何既不能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传闻得到了证实,因为已经一年有余,我未曾从您那里收到只言片语!这些传闻是,您似乎在生我的气,为的是……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性格的不好的评价!可是,要知道,我写得很诚实,不过是我的所见所闻而已。关于所有的人我都如实记述——关于巴尔蒙特,关于库普林,关于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关于索洛古勃……我收到一位重要社会活动家写来的一封信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的信。他也不满意,然而却有所不同。‘如果说实话,那就应当说出全部的实话,而不是欲言又止。您写道,他们,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没有卖身投靠。他们恰恰是卖身投靠……而且是一贯为之:投靠毕苏斯基,投靠墨索里尼,投靠希特勒……’我回答道:这些我不仅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我的回忆录与其说过分尖刻,不如说是过分温柔。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词。全都是实情,甚至还不是十足的实情。您不了解他们,没有贴近观察过……”

回忆录《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刊登于1950年1月份的《新俄罗斯言论》杂志,苔菲信中注明的日期为当年的4月25日。而1951年3月17日苔菲则通知安德烈·谢德赫:“我在重读我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

与《吉皮乌斯》，请相信每句话，而且，本应说出来的东西我连一半也没有说出来。可是我不想涮洗脏衬衫（原文为法语）。他们要凶狠得多，而且还不是可笑的凶狠，而是魔鬼般的凶狠。季娜还有趣味。他则没有。有时候她身上还能显示出一点人性来。他却从来不会。”

顺便提一下，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说过某些与苔菲相似的想法，这似乎能印证她的正确性：

“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我曾经而且现在依然是个谜。应该说老实话：作为一位作家，在我看来，他是低档次的；而作为思想家，他几乎不值一提……她，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是位普普通通的人，有才气，很聪明（面对面时比在文章中更聪明些），但就其全部构成来讲，是与你我大家同样的人。而他——却不是。

单独与他面对时总感到有点‘不自在’，而且还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谈话时断时续：您面前这位的思想与情绪带有与生俱来的诡异色彩，全身枯燥乏味，有点像‘火星人’。同时，他身上还有某种琐细生活的气质，精打细算，但这是某种非本地的东西，是某一特种天赋，很难界定它。”

回忆录——不是日记。日记一般记录事件与感受，在时间上几乎与其同步（诚然，日记有时候也包含着回忆录）。因此，日记似乎更接近真情实况，比回忆录更可靠。回忆录作者能够稍稍美化一下自己的角色，稍稍歪曲一下发生的事件，在情势的制约下改变对人对事对某些现象的评价。确实如此。可是，任何人的回忆录都从来不会被视为在时间和事件上惟一可靠的信息来源。回忆录的珍贵价值恰恰在于对某个事件的个人观点上，在于对某些人物在世界性悲喜剧中的个人评价上。正是由于比较形形色色的作者的回忆录，后来者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逝去的时间。

在《回忆录》（它首次发表在巴黎的《复兴》*报上）中，苔菲涉及的是刚

* 《复兴》：1. 1924—1935年，巴黎，日报。2. 1936—1940年，巴黎，周报。3. 1949—1974年，巴黎，文学政治杂志，共出刊243期。（此为译注，后同，不另标出。依据：《列宁著作资料汇编》，页730；《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页203）

刚过去不久的时间,它还未来得及将记忆的色彩、细节与精确度冲淡。所以,早已消失在时间的云雾中而又在回忆录页面上闪烁的人物才有可能那么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乌克兰小镇火车站月台上的小男孩儿,挺身保护无辜者的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敖德萨卫戍司令格里申-阿尔马佐夫,与苔菲一起开始南下旅程的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还有许多其他人物让本书的页面生辉,使无形的时间成为几乎可以触摸的实体。某些人物,譬如用化名的古西金,是作为散文作家的苔菲无可置疑的成功。因为古西金已经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文学典型,它体现了寄生在艺术上的整个阶级的性格特征。当然,他还相当渺小,并无大害,这么说吧,他才刚刚出生。然而,正是从古西金这样的群体中诞生了那个猛兽般的阶级,它今天披着羔羊般老板文雅的外衣,用自己的獠牙与利爪控制着艺术的躯体,控制着艺术消费者的钱包。

在苔菲的《回忆录》中有许多闪光的篇章,作者在那里以自己特有的幽默与深入性格本质的技巧,简洁而令人信服地再现了时代的风貌。苔菲的著作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人为什么要在内战的高潮中,或者在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后,便告别了俄罗斯。内战——这并非历史中的常见现象。在这样的时期很难保持中立,只好站在这一方或那一方,尽管往往以消极的形式。要做出选择。苔菲也就这样做了……她写的就是这个。她也顺便交代了一下,她如何与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一起,从志愿军的监牢里拯救因虚假情报被白军逮捕的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

苔菲没有描写志愿军的监狱(她也不可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在国内战争期间,与在其他战争中一样,宣传的作用被扩张。如果说白卫军的报纸夸大报道红军的残忍,则红军的报纸也同样竭力攻击白军的兽行),却几次写到显然是被红军使用过的绞刑架。

苔菲的书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俄罗斯人——他们现身于白卫军阵营,告别了故国的海岸,怀抱着回归故国的期望,却终生未能再次踏上俄罗斯的大地。

在苔菲建议命名为《我的编年史》的这本书中,包含着一些异样题材的作品。在这里她想讲述关于某些格外引人注目(在不同方面)的人与事,她曾经与他们相遇,并且曾在多年间与其交往,抑或仅仅接触过两三次(例如,拉斯普京),可是这些人太不同凡响,他们或在文学史上,或在俄国与俄国侨民的命运中,最后,在苔菲个人的命运中,发挥过显著作用。她的《我的编年史》里的主人公,无论在才能与知名度上,无论在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中自己发挥的作用上,都是不均等的。然而,他们全都在作家的生活中出现过,并在其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立刻会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在《编年史》的章节中没有一章是关于目前仍然在世者的。诚然,在《格奥尔吉·丘尔科夫与梅耶荷德》中作者附带说明:“我不知道格奥尔吉·丘尔科夫是否还活着。”不过,显然她已经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此时丘尔科夫已经不在人世。那么,这一原则得到了遵守。关于仍然在世者,她或者一带而过,或者以某个大写字母来代替。大概,这其中有所内在的分寸感在发挥作用:苔菲知道,并非每个人都乐意让别人写他们,——有时候会遭受伤害。突然,她谈及的某人此刻正在苏联——他便有可能因为“白卫军作家”写到了他,因此便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苔菲的命运在不同的时期与其笔下人物的命运发生过交集,他们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从她口中得知关于甚至早已熟知的人的一些什么新鲜事,或者关于早已被忘怀的人物的什么新闻——这永远是很有趣的。所以,她《编年史》的每一章,或者某篇特写——都是艺术作品,主人公在其中生活与行动的时代有时与我们相隔半个多世纪,或四分之三个世纪,有时候几乎是一个世纪(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发行于1905年!),从过去人们的相互关系中,从他们的探索与迷惘中,我们会看到某些属于我们的同时代人才具备的特征。

我们会得知关于尼古拉二世与列宾的人格中的某些新东西,了解到当代俄国读者几乎对其一无所知的洛洛,我们会对亚·伊·库普林感到更加亲切,关于季·尼·吉皮乌斯和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这类“怪人”我们

也会有新的发现。

深情厚谊与相知相交的纽带将伊·布宁、苔菲与鲍·潘捷列伊蒙诺夫这三位俄罗斯作家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遥远的巴黎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除去一些第三者的回忆,还保存有友好圈子成员的物证。在一张拍摄于1949年的照片上,在摆放在花园里的桌子旁边,他们置身于其他作家之间:头戴鸭舌帽的布宁、苔菲与站在旁边的潘捷列伊蒙诺夫。有苔菲给安德烈·谢德赫寄到纽约的信,有写在书页上的题词。这是苔菲赠给潘捷列伊蒙诺夫的诗集《沙姆拉姆》,上面的题词是:“给亲爱的精神上的兄弟鲍·潘捷列伊蒙诺夫。请晚上转身向着东方,并回忆那逝去的一切”。这是写在潘捷列伊蒙诺夫的作品《圣弗拉基米尔》上的题词:“赠给迷人的,无与伦比的,聪慧与超凡脱俗的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苔菲。感谢您的鲍·潘捷列伊蒙诺夫”。

这是一张从记事本上扯下来的方格纸。上面有苔菲在去世前几天,也许是前几个小时,写下来的几行字:

如果谁将自己的吗啡赠给自己的兄弟,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高尚的爱了。

正是如此!!

娜·苔

写这条札记的时候,苔菲已经被疾病折磨得连说话都很困难了。在这里,她感谢已于两年前去世的鲍·潘捷列伊蒙诺夫的遗孀塔玛拉。她为苔菲送来了吗啡。吗啡能让她在短时间内摆脱痛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苔菲也未曾失去精神力量,也未曾失去对幽默与戏谑的偏好。

在一生中她始终是这样的——勇敢无畏,言辞犀利,幽默诙谐,聪明机智,魅力十足,卓尔不群,无与伦比。



菲 棠

玛丽娅与娜杰日达·洛赫维茨卡娅姐妹。她们双双将扬名于俄国文学史。一位将以笔名米拉·洛赫维茨卡娅成为著名诗人，另一位则以笔名苔菲成为卓越作家。

